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通讯

二〇〇九年第二期（总第3期）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

<http://www.lib.szu.edu.cn>

深圳大学图书馆印度文献资料室

E-mail:szucis@yahoo.com.cn

2009年8月15日

本期要目

深切悼念季美林先生

印度驻华大使吊唁季美林先生

印度总理就季美林逝世致函温家宝总理

深圳大学致北京大学季美林先生治丧工作组唁电

深圳大学校长深切哀悼季美林先生

魂归朗润园

我对季先生有一个承诺

凝望远去的背影——追忆我与季美林先生的交往

盛世崇文——季美林先生追悼活动散记

印度邦格拉舞蹈团来深圳大学演出

喀拉拉邦教育与文化部长访问我校

我不过从传统艺术中取一瓢饮——采访印度著名画家阿·罗摩钱得尔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通讯

二〇〇九年第二期（总第3期）

主编：郁龙余

执行编辑：黄蓉 朱璇

目 录

印度驻华大使吊唁季羨林先生	4
印度总理就季羨林逝世致函温家宝总理	5
深圳大学致北京大学季羨林先生治丧工作组唁电	5
深圳大学校长深切哀悼季羨林先生	6
魂归朗润园	7
我对季先生有一个承诺	9
凝望远去的背影——追忆我与季羨林先生的交往	11
一篇写了十年的读后感	14
盛世崇文——季羨林先生追悼活动散记	15
印度邦格拉舞蹈团来深圳大学演出	20
喀拉拉邦教育与文化部长访问我校	22
我不过从传统艺术中取一瓢饮——采访印度著名画家阿·罗摩钱得尔	23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大事记	24

Newsletter of Indian Studies, Shenzhen University

2009.8.15

Contents

Ambassador of India to China offering condolence for Mr. Ji Xianlin' death	4
Indian Prime Minister Manmohan Singh sending his sympathies on the death of Mr. Ji Xianlin to Chinese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5
The call of condolence for Mr. Ji Xianlin from SZU.....	5
President of SZU Lamenting Mr. Ji Xianlin' death profoundly.....	6
Back to Langrun Garden.....	7
I made a promise to Mr. Ji.....	9
The sight of Jixianlin's back: Recall the association with Mr.Ji Xianlin	11
An article on a book written for ten years	14
Noble article in time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essay on the activities of condolence for Mr. Ji Xianlin	15
Performance of Bhangra Dancing Group in SZU.....	20
Minister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of Kerala state visiting SZU	22
I only get one spoonful from the traditional art—the interview of famous Indian painter A.Ramachandran	23
Chronicle of Center of Indian Studies of SZU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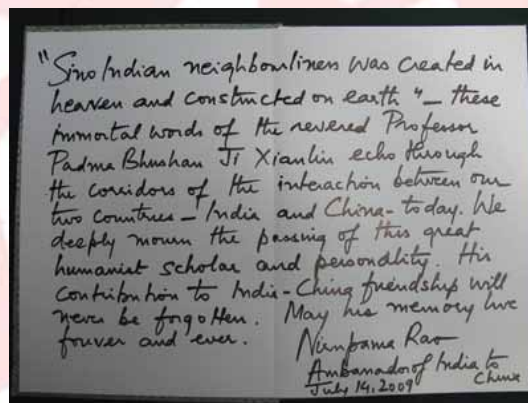
悼念季羨林先生

印度驻华大使吊唁季羨林先生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2009-07-16)

7月14日上午10时，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女士专程来到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党委杨河副书记、外国语学院程朝翔院长、刘树森副院长以及南亚系主任姜景奎教授的陪同下吊唁了季羨林先生。

拉奥琦女士在季先生的遗像前鞠躬、行注目礼，表达了深深的哀思。她在留言簿上写道：“尊敬的‘莲花奖’获得者季羨林教授的不朽名言‘中印为邻，上天使然，建于人间’至今回荡在中印大地。我们深切怀念这位伟大的人文学家，永远铭记他对中印友谊的贡献，愿他永生！”。



吊唁之后，杨河副书记和拉奥琦女士进行了会谈。拉奥琦女士代表印度政府、印度人民以及在华工作和学习的印度同胞对季先生的去世表达了深切哀悼之情，并回顾了自己两次拜会季先生的情景。她称赞“季先生是世界顶级学者，是印中文化的友好使者，是印度人民的好朋友，为印中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印度政府最高奖“莲花奖”的获得者，他的去世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也是印度的巨大损失。我代表印度政府、印度人民以及在华工作和学习的所有印度同胞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拉奥琦女士说，自己曾多次访问北京大学，每次都有很多收获，结识了北大王邦维教授、姜景奎教授等许多知名学者，并和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她希望与北大的朋友们保持联系，把印中文化交流发展得更好。

杨河副书记代表北京大学对拉奥琦女士的前来吊唁表示感谢，对拉奥琦女士长期以来致力于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和对北京大学的支持表示敬意，并希望她回国以后继续关注北大，关心北大。

拉奥琦女士对中国很友好，是印度驻华大使，目前已经被印度政府任命为外交秘书（常务副外长），并将于 7 月 15 日回国赴任。

印度总理就季羨林逝世致函温家宝总理

（来源：新华网，2009-07-29）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日前致函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代表印度政府和人民对季羨林先生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辛格表示，季教授是世界最著名的印度学家之一。他在佛学和印中千年文化交流史领域知识渊博，并因此广受尊重。他将印度典籍译成中文，对增进中国对印度文化的理解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感谢他对印中关系作出的巨大贡献，印度政府和人民 2008 年授予他“莲花奖”。

辛格说，季教授的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和倡导增进两国延续数千年关系的杰出人士。

深圳大学致北京大学季羨林先生治丧工作组唁电

北京大学季羨林先生治丧工作组：

痛悉季羨林先生辞世，深圳大学全体师生深感哀恸。季羨林先生的逝世，是教育界、学术界的巨大损失。季羨林先生对深圳大学的关心、支持和指导将永远铭刻全体师生的心中，激励我们将季羨林先生未竟的事业发扬光大。谨向季羨林先生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季羨林先生的高尚人格与治学风范与世长存。

季羨林先生的卓越建树和巨大贡献永垂不朽。

深圳大学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四日

（原刊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深圳商报》）

深圳大学校长深切哀悼季羨林先生

北京大学季羨林先生治丧工作组：

惊悉季羨林先生于7月11日逝世，我校师生莫不哀痛。深圳大学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受到季羨林先生的热情关怀与亲切指导。

我们牢记，深圳大学建校之初，季先生应张维校长之邀坦陈自己的办学理念。于是学校一开始就重视文科，聘请李赋宁、汤一介、乐黛云、胡经之等名家来校任职。

我们牢记，季先生于1985年来我校出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重要演讲。20年后，季先生又为在我校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挥毫题词：“承接古今，汇通中外。”

我们牢记，季先生身为蜚声国际的学术大师，对我们大大小小的请求，无不一一慨允。我们请季先生担任深圳大学名誉教授、文学院院长顾问、印度研究中心顾问、中印研究丛书编委会顾问，季先生都愉快地答应了。2006年，我们举办中印友好年·深圳大学印度节，季先生发来贺词说：“在过去几千年中，中国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典籍。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盛不衰，与吸收佛教文化的精华，是分不开的。但我个人认为，中国高僧翻译之功勤而研究则没能跟上。现在，虽已时过境迁，但研究仍有其重要性。祝深圳大学佛教学研究不断取得胜利。”

我们牢记，2006年底，季先生给了我八字题赠：“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对一名教师来讲，这八个字是最高的奖赏和最大的鞭策。我认为，季先生的题赠，既是送给我个人的，也是送给全体深大老师的。我们一定不辜负季先生的殷切期望，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努力把深圳大学办成立足深圳，面向国际，高水平、有特色的创新型一流大学”。

季羨林先生的道德风范，永远鼓励我们前进！

中国当代学者的伟大典范，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季羨林先生永垂不朽！

北京大学学子

深圳大学校长 章必功 敬挽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七日

（原刊于2009年7月20日《深圳商报》）

魂归朗润园

乐黛云

季羨林先生终于离开了他久住的医院，平静，安详，没有痛苦，也没有现代各种医疗器械的折磨！我私心总以为先生是重返他住过几十年的朗润园 13 公寓旧居，又再与我为邻。我总觉得先生和过去一样，正漫步在那条美丽的湖畔幽径，悲伤地凭吊那棵无端被拦腰劈断的老紫藤；我仿佛又看见先生坐在湖边家门前那张简朴的长椅上，时而和邻家重孙辈小孩儿嬉笑，时而远眺夕阳，默默沉思。他热爱这周遭的一切，特别是春日沿湖盛开的二月兰。二月兰，联系着先生的生命体验和他的哲思。先生写道：“二月兰一怒放，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每当读到这里，我就不禁想起鲁迅写的：“猛士出于人间”，“天地为之变色”，想起在各种逆境中巍然屹立的伟大人格，也仿佛看到了先生的身影。先生曾在二月兰花丛中，怀念早逝的爱女，目送她“穿过左手是二月兰的紫雾，右手是湖畔垂柳的绿烟，把我的目光一直带到湖对岸的拐弯处”，也曾充满爱怜地回忆“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的“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先生赞美二月兰说：“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先生将自己的人格和灵魂移情投射到平凡美丽的二月兰之中。他曾在这开满了二月兰的湖滨，满怀深情地咏叹着那种淡定而美好的生活：“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只道是寻常”！这一切曾经是“寻常”，又是多么“不寻常”啊！

今天，先生亲手播种的荷花（季荷）正在盛开，比往年都开得多而鲜艳；远来的白鹭和野鸭在沿湖沼泽中低徊，仿佛在等待什么人；柳树丛中的杜鹃，声声呼唤着“归来”。我和他们一样，平静地等待着先生魂归朗润园！我总觉得我一定会在哪一个拐弯，哪一张长凳上与先生突然相遇！

先生一直十分关爱我，是我的最后一个父辈。一个人，不管年纪多大，只要有一个真心视为父辈的长者在身边，就会觉得自己还是孩子，可以犯错误，可以“童言无忌”，直抒胸臆。30 年过去，先生就是这样，耳提面命，时而批评，时而表扬，带我一路走来！

记得是 1980 年的一天，先生突然对我说起，应在北京大学成立比较文学学会和比较文学中心，经过讨论，他担任了两个新组织的领导者，我则充当了跑腿的马前卒。那时，正在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原没有“比较文学”这个条目，先生坚持必须加上，并命我撰写。这就给了我一个全面研究这一学科的机会，从此走上了比较文学的不归路。先生一再强调“有了比较，多了视角，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能看到了；以前想不到的问题能想到

了，这必能促进中国文学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让世界比较文学界能听到中国的声音。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也决不能低估”！当遇到困难时，先生总是鼓励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脚底下，从没有现成的道路，只要我们走上去，锲而不舍，勇往直前，在个别时候，个别的人，也可能走上独木桥，但是最终会出现康庄大道。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1985年，全国36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联手策划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因为是“全国”，又是“跨省组织”，我们碰了许多钉子，都无法获得批准。最后先生亲自找了胡乔木和体改委，学会才成功地在深圳如期成立。先生在会上强调比较文学所要探索的就是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个特点是以我为主，以中国为主；第二个特点是把东方文学纳入比较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我沿着先生指示的方向前进，任何时候都感到背后有先生强有力的支持。

先生对我的指引，远不止于学术。2000年先生主编《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命我编选《季羨林散文精选》。我有幸阅读了先生的绝大部分散文。我认为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先生的影响远不止于他的学术，而是他数量极大的散文和透过这些散文所表现出来的理想追求和人格魅力。和先生商量，我把这本散文集命名为《三真之境——真情·真思·真美》。使我感动至深的首先是先生对祖国的一片深情，这种深情早已超越一般理性，化为先生自己的血肉，化为发自内心的纯情。以这样的热忱作为生活的动力，生活就会色彩烂漫而又晶莹透明。古今多少文字“灰飞湮灭”，惟有出自内心的真情之作，永世长存，并永远激动人心。如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所说：“凡声，其出于情者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正是心怀这样的挚情，人就可能于绝处逢生。记得先生的一小段散文是：“这枯枝并不曾死去，它把小小的温热的生命力蕴蓄在自己的中心，外面披上刚劲的皮，忍受着北风的狂吹；忍受着白雪的凝固；忍受着寂寞的来袭，切盼着春的到来”。这些话给过我那么多亲切的希望和安慰，助我度过严冬。事隔四十余年，我至今仍难以忘怀。“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是先生所有散文最根本的主题。先生临去前一天接见一位拟编《少年季羨林》的编辑时，曾将这8个字接连重复了三遍。这是先生心心念念，要传之后辈并流传永远的嘱托。

七月流火，朗润园处处洋溢着先生移情寓意于二月兰的那种“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的蓬勃生命力。我和朗润园的大自然一起敞开心扉迎接先生归来。

2009.7.13于朗润园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深圳大学首任
中文系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我对季先生有一个承诺

郁龙余

2009年7月11日，星期六。对我这个上班族来讲，难得悠闲，在家中看中央台的国际频道……突然，一条消息传来——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羨林先生，于11日9时在301医院逝世。虽然，季先生功德圆满，以百岁之身谢世，可以说是一件“白喜事”，但是过去的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不觉悲从心来，悔从心来。

1984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将要离开学习、工作了19年的北京大学，去十三公寓向季先生辞行。先生几乎没有说话，似乎对我南下深圳大学心存忧虑。他默默地送我出门，目送我消失在黑夜之中。走了一阵，我泪眼回望，只见他还在昏暗的灯光下。自此，我每次去看望他，他总是要送我到门口，直到看不见我。不论晴好天气还是刮风下雨，不论他一人在家还是高朋满座，不论我怎样劝说，甚至将他扶送回屋，他都要送我到门口，目送我远去。朗润园，十三公寓门前，先生慈祥的目光，如今成了我永远的记忆。

季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赋得永久的悔》，现身说法，讲寸草难报三春晖。回想四十多年来，他对我关爱有加，而我不但无甚建树，而且总是办不好事，心中充满难释之悔。

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大学召开。会前，乐黛云、胡经之两位系主任，对我寄以厚望，要我全力做好筹备工作及会务安排。季先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原动力，我也一心扑在工作上。可是，开会前我突然病倒了，不能继续再为会议做事。乐老师哭了。我觉得自己不争气，非常对不起她，对不起季先生。

在东语系，几次听季先生讲，只要用功夫，一个字就可以写一本书。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在晚年花数年时间在一个“糖”字上下功夫，写了一部《中华蔗糖史》两卷，70多万字。在写作过程中，他得知深圳大学的“全唐诗检索系统”研制成功，写信给我，希望帮助检索一下“糖”、“蔗”一类的词。我向项目组的老师转达了季先生的想法。大家十分热情，很快就将检索结果打印出来，我立即寄给了季先生。他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再进一步。可能是这个系统当时尚未成熟，以后便没有了下文。季先生在书中引用了《全唐诗》的六条材料，然后说：“我从深圳大学得到的材料就这样多。看样子是不全的。”每每想起此事，我总觉得自己未能尽心。1998年2月，季先生将这部书题签后送我。我读后颇有收获，就写了一篇《毫厘弄饴——读〈中华蔗糖史〉有感》，可是竟没有改出。昨天，翻阅季先生的赠书，这篇十年前的旧稿仍夹在书中。人已去，稿未竟，后悔不已。

1985年，系主任乐黛云教授嘱我为“比较文学丛书”编一本《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我编好后请季先生写序。他很快就写好，我收到后就寄往出版社。可是，不知何因他们竟没有用。

后来，季先生将这篇序以《资料工作是影响研究的基础》为题，收录在《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中。文章一开头写道：“在乐黛云同志主持下，郁龙余同志编选了一本中印文学关系源流。这是深圳大学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贡献，郁龙余同志来信要我写一篇序言。写序本不敢当，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点眼前我自己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想法”。在题注中季先生说：“本文是为《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选编）所写的序，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出版该书时未收入。”这又是我心中的一悔，悔当初不再力争一下。

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我和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张德福教授，登门看望季先生，说起东语系几位退休教授殷洪元、马孟刚等，计划编写一本《汉语印地语大词典》。季先生闻讯大喜，说这是一件对中国对印度都有益的大好事，表示坚决支持。我将季先生的话告诉殷洪元老师，他十分激动，很快就组织起编写班子，进入了正式的工作状态。作为对母校和老师的回报，我从各个方面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随着书稿的进展，我请季先生为这部词典题写书名。不久，季先生将写好的“汉语印地语大词典”八个字寄来。为了美观，他写了两款，并要助手钤上四款印章，由我们挑选。所有编写者都很高兴，编写的速度不断加快。到2005年，书稿终于要杀青了。但是，排版的技术问题，出版的资金问题，困扰住了大家。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排版的字符问题在南京解决了，印地语专业成了非通用语种的全国重点学科，出版经费也应该不成问题了。可是，前后10年过去了，季先生走了，殷洪元、马孟刚等老师也都八十好几了，《汉语印地语大词典》还在出版的过程中。我心中不免又多了一份痛与悔。季先生是看不着了，殷老师、马老师等作者不会看不见吧。

《东方文化集成》是季先生最为上心的文化工程。他担任丛书总主编和综合编的主编。去年，总编委的副主编张殿英教授来电话，说：“我们去看望了季先生，精神很好。他特别说，综合编的主编不兼了，你来当，你和天津师大的孟昭毅合作。”这个电话，让我想起了八九年前，《东方文化集成》出版遇到了资金问题。那一次我到北京，季先生和我商议了很久，说不知道天上哪朵云里有雨。最后他叫我到广州找他的一位友人之后。我说，我会努力试试。我回到深圳后，虽然一直想着季先生的嘱咐，但一直没有合适机会。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友人之后调离了广东。一直到今天，我也没能为《东方文化集成》筹到什么钱。现在季先生走了，《集成》出版了一百多种，离季先生出500种的目标还很远。看着他在《中华蔗糖史》和《东西方议论集》的扉页上的题字，心中又是一阵痛与悔。

2007年，季先生来信，写在外地某单位的信笺背面。我知道季先生一向俭朴，他的一些散文名篇，是写在香烟纸盒上的，没有专用信笺。于是，和文学院的几位同学商议，给他印制一些专用信笺。蔡枫和黄荣章搭档，接受了这个任务。蔡枫懂中印文化，黄荣章是当年全国大学生平面设计金奖获得者。他们设计了多个样本，改了十几次，终于定下稿来。印好后寄到北京，季先生见了很高兴。说这是他见到的最华贵的信笺，舍不得用。由于纸重，当时

只寄去了一部分。这年6月，我去看望他，又带去了一部分。并告诉他，深大还有不少，下次再给您寄来。现在，季先生走了。看着这一本本“季羨林用笺”，再也寄不出去了，痛和悔从心底涌来。

我在《中国印度诗学比较》的后记中，这样写道：爱之愈切，藏之愈深。竟把季先生的题笺藏丢了。“四十多年来，先生给我多多，我却总是辜负，丢失的又何止一纸题笺！”今天，再读这些文字，愈觉痛与悔。

我必须尽快走出痛与悔，因为我对季先生有一个承诺——写一部《季羨林评传》。当下中国书坊，各种各样关于季先生的书籍，琳琅满目。但是，没有一本以学术评价为主要内容的季先生的评传。2000年的一天，乐黛云老师告诉我，2001年是季先生90华诞。她想编一本《季羨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约我写一篇文章。特别关照：“你是季先生的嫡传弟子，可得用心好好写。”我遵嘱写了《季羨林与印度文学》一文。后来，将此文的后半部分以《季羨林的治学之道》为题，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从此时开始，我萌发了撰写《评传》的念头。随着资料的收集，我的信心也越来越足，胆子也大了起来。我将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季先生。2007年6月，我去301医院看望季先生，又当面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心志。获得他的肯定与支持。季先生的态度很重要，因为我知道，有的活不是人人都能干的，除了自信心，还要有他信心。我只是季先生数千学生中的一个，要写好《季羨林评传》谈何容易！几年来，我一边准备，一边等待。等待他1994年以后的文字结集出版，等待他的英文论著翻译出版，等待他的日记整理出版，还等待机会向他当面请教一些疑难问题。现在，季先生走了，我一空依傍，一切都须重新考虑。但是，我对季先生的承诺不但不变，而且更加坚定。痛而后知悔，悔而后志明。学习季先生的道德文章，尽自己的心力写好《季羨林评传》，是我今后最重要的工作。

2009年7月12日

（原刊于2009年7月22日《深圳商报》）

一篇写了十年的读后感

郁龙余

一九六五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投到季羨林先生门下。当第一次在会上听他说：只要用心，一个字可以写一本书，比如“佛”字。当时很是吃惊，此后慢慢就明白了。季先

生的一辈子，用了不少时间在“佛”字上做文章，是世界著名的佛学家。到晚年，他又花了数年时间在“糖”字上下功夫，写成了一部《中华蔗糖史》上下两卷，70多万字。如今，这部《糖史》已经成为世界名著，凡是研究中华蔗糖发展、中外糖文化交流的，都视季著为主臬。

1998年的初春，季先生将这部专著赠送给我，在扉页上这样题笺：龙余弟指正 季羨林 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季先生给我的有题笺的赠书不下二十种。称呼不外龙余、龙余兄、龙余弟、龙余老弟几种。凡是传记类的，写“留念”；凡是学术类的写“指正”。体现出一位学术大师对晚辈的亲切和虚怀若谷。季先生的谦逊，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华蔗糖史》的写作过程中，他向东语系各语种的老师请教，问糖、白糖、红糖、冰糖在各种语言里是怎么说的。关于印地语中的糖，他就问刘安武老师，也问过我。他得知深圳大学研制成“《全唐诗》检索系统”的消息，就给我来信希望得到帮助。后来在他的书中，用了六条检索材料。

季先生著作等身，但对晚年的这部《中华蔗糖史》特别看重。因为，他一直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而给这部专著戴上一顶漂亮的帽子——《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晚年的季先生，负责或顾问不少文化工程，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华儒藏》等等。但是，他最上心的是《东方文化集成》。他不但担任总主编，还担任综合研究编的主编。搭起了一个由中外著名学者组成的顾问班子和编委会，他用中英文写了一篇宣言性质的《东方文化集成总序》。而这部《中华蔗糖史》是《东方文化集成》中的第一部。

读了季先生的赠书，收获良多，感慨良多。于是我提笔写了名为《耄耋弄饴——读季羨林〈中华蔗糖史〉有感》的读后感。但是，不知何原因，这篇读后感竟没有写完。7月11日传来季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找出他的所有赠书，发现这篇没有写完的读后感夹在书中，纸张已经泛黄。我不觉悲从心来，悔从心来。做事不上心，虎头蛇尾，愧对季先生的提携。这篇没有完成的旧稿原文如下：

在这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道亮丽而奇异的景观：一位望九老者，不管严冬酷暑还是晴天下雨，也不管是访客如云还是门可罗雀，他每天清晨四点起身，或翻阅典籍或伏案疾书，每天工作十多小时。这位老者就是北京大学教授季羨林先生。季先生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这早就在中国学林传为佳话。令人惊奇的是，他在学术上老当益壮，愈老弥坚，学果越来越丰硕。先生学识博大精深，东西兼通，有《季羨林文集》24卷行世，而且进入晚年，还投入巨大精力主持众多大型文化学术工程。

人老思想不老，永葆学术青春。这是季先生与其他许多老学者的重要区别。功成名就的他，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大无畏的勇气，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论一出，惊世骇俗，叫好者有之，摇头者亦有之。但是，十多年过去，赞成者愈来愈多，反对者愈来愈少。河东河西论，不仅是季先生晚年学术的指导思想，也是他的拥护者

们审视世界文化的基本出发点。河东河西论的出现，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他预示着 21 世纪东西方在文化地位上将产生根本性变化。

考据是季先生的专长。在他的晚年，一方面主持众多重大文化学术工程，提出重大学术命题；一方面仍然念念不忘他的考据研究。1997 年出版的《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便是最新一例。考据，是一项极枯燥但又极可靠的研究工作。季先生用数年的时间，从无数中外文献中爬罗剔抉，博征旁引，归纳分析，梳理锻打，终于写成七八十万字皇皇大著《糖史》两卷。

季先生在耄耋之年，为何要花数年时间，撰写《糖史》呢，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他对文化交流史有兴趣，而糖恰恰为文化交流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例证。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说：“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送去些什么呢？送去的一定是我们东方文化中的精华。”计划出书五百种的《东方文化集成》就是先生组织广大学者专家送去的文化瑰宝，其中《糖史》，就是先生在晚年，送给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一份甜蜜的厚礼。他希望“从这一件小事情上，让人们感觉到实在应该有更多的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有更多的互相帮助互相依存意识……”

这篇读后感没有写完。十年后的今天，我有必要加上一个结尾，把它写完整，以此表达对季先生的追思。这个结尾是：

季先生，作为乾嘉学派传人陈寅恪的学生，非常擅长考据。同时，对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推崇备至。这部《中华蔗糖史》，是季先生对陈寅恪、胡适学术思想的综合运用。《中华蔗糖史》告诉我们两点：一是怎样写文章，怎样取弘用精；二是注重学术的现实意义，考据不是“思古之幽情”。季先生希望人们通过对“糖史”的认识，“从而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解决一些威胁着人类全体的问题，比如人口问题、环保问题、资源问题、粮食问题、自然界生态平衡的问题，甚至还有淡水问题、空气问题，等等，等等。”一部以考据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著作，自然而深情地表达对人类生存的关切。这就是季先生写作《中华蔗糖史》的目的与意义。

季先生走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永在。

2009 年 7 月 17 日

（原刊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深圳商报》）

凝望远去的背影

——追忆我与季羨林先生的交往

[印度] 墨普德

龙余案：墨普德，是印度著名汉学家普利亚西达·慕克吉（Priyadarsi Mukherji）的中国名字，现任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他受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派遣，来深圳大学任讲席教授一职，与中国同行有诗文唱酬。此文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8月14日15版）现经作者同意，全文刊载于本书。以享广大读者。

季羨林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满怀悲伤。虽然早就听说季老住进医院，我却坚信他能活到100岁。中国有句俗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季老的去世就像闪耀在星空中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中国东方学泰斗季羨林，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印度学家，也是印度人民的好朋友。除了英文、德文外，他还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这些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写这篇文章时，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我与他交往的日子。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我开始学习中文是同一年，正是在印度学中文期间，我听说了季羨林的大名。

1986年我到中国留学，第二年从复旦大学转到北京师范大学准备学民俗学。5月3日，我在北京大学第一次见到季羨林先生。他在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一边品茶，一边交流学术问题。季老把他研究翻译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七卷和他自己的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送给我，并亲笔题字。他告诉我，他从1936年起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从此与印度结下不解之缘。看到他将《罗摩衍那》的梵文原著译成中文，我很惊奇。看了他对中印文化关系的理解，我觉得他对印度文化的解释没有丝毫偏见，没有一点“华夏中心”意识。读到他的“印度文学在中国”、“《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等篇章时，我感到他不仅对印度古老文化有深刻理解，而且同样精通于中国的国学。令人欣赏的是，季老虽然学问高深，但从不炫耀，他是一位勤勉而谦逊的学者。

我曾阅读过季老在《东方研究论文集》中发表的《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的文章，受到很大启发。我在印度发表的文章中多次提到季老对中印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我还阅读过季老在他主编的《印度文学研究集刊》中发表的文章《〈罗摩衍那〉在中国》。世界上有不少学人曾就《罗摩衍那》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及文化中的演变著书立说，而季老是讲述《罗摩衍那》在中国如何演变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2002年我来华研究中印上世纪40年代的政治外交关系，成为首位从中印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研究印度革命人物的印度学者。我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搜集资料，心里很想与季老见一面。7月1日上午，季老亲自打电话给我：“你回国之前咱们一定要见一面。”那天正好就是我要回国的日子，我急急忙忙坐上出租车赶到北大校园季老住处——朗润园13公寓201房。91岁高龄的季老还像以前一样热情。他说：“这次你来中国是我亲自推荐、批准的，今天我请你到我家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件事，顺便也聊聊天。去年是挑选的泰国学者，今年选拔印度学者，这任务轮到我身上，我就选中了你。”听到季老这番话，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紧紧握住季老的手，对他表示由衷的感谢。季老将他新出版的两本书送给我，其中一本是他的散文精选《三真之境》。在他的寓所里，我与季老合影留念。合影时，季老坐在沙发上，握着我的手。没想到，那次相见竟成为永别。

在季老的散文集中，我读到他在德国留学时的回忆。他对梵文这样解释：“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梵文恐怕是语法变化最复杂、最烦琐，词汇量最大的语言。语法规律之细致、别扭，哪一种语言也比不上。”在另一篇文章中，季老写了他对印度友人的感情。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曾访问印度，回国之际的柔情表现出季老对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珍惜。最近季老被印度政府授予“帕德马布山”（意为“莲裳奖”），我认为这项荣誉早就应该授予他。

2008年，经过印度全国性选拔，我被推荐到中国深圳大学进行为期14周的学术访问，有幸成为这个合作项目的第一位荣誉访问教授，也成为第一个在中国高校使用汉语教学的印度人。教学工作虽然繁忙，但我一直想念季老，很想再见他一面。可我听别人说，季老已成“国宝”，见面很难。但我知道，季老如果见到我这个老熟人，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或许还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乐趣。然而我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这也是我终生的遗憾。

安息吧，我最尊敬的老师、印度人民的朋友季羨林先生！

（原刊于200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盛世崇文

——季羨林先生追悼活动散记

郁龙余

7月11日，传来季羨林先生逝世的消息。从北京到台港澳，从中国到世界各地，人们

用不同的方式，来悼念这位当代中国的伟大学者。

我受深圳大学和校长章必功的委托，专程赶往北京，向北京大学治丧办递交唁电与悼词，并参加季先生的追悼会。7月18日晚，我给《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打电话，一是告诉她我临走前发给她的《一篇写了十年的读后感》一文中，漏了两个字；二是问她给商报写的文章，以多少字为宜？她说字数不限，您就写吧。这样，19日我参加追悼会，除了季先生的学生的身份之外，还多了一个业余记者的身份。没有想到，这两个身份的叠加，竟让我多次始料不及。

乘头班车来排队参加追悼会

按照公告，季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09年7月19日10时在八宝山公墓东礼堂进行。这天早上七点半，特意从上海赶来的吴永年教授来电话，说他和王树英老师已到，问我何时到。我说10点才开始，干吗那么早？他说：王老师一个晚上没睡着，说他是农村人，习惯赶早不赶晚。我问：你们是不是最早的？他说：哪里，已经来了许多人。南亚所的老主任杨老师七点钟就到了。我说：请告诉杨老师，我到了想见见他。等我和董友忱教授赶到时，已经九点多钟。杨老师告诉我：他一九六一年就认识季先生了，敬仰他平实的为人，平实的文章。没有任何花花绿绿，一看就懂，但意义深刻。杨老师今年76岁，家住昌平，坐五点半的头班车赶到八宝山。杨老师说，他不是最早的，在他之前已经来了不少人。他到了之后，就在地铁口给人做引导。季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杨老师是办公室主任，做迎来送往的工作。现在，季先生走了，杨老师来为他做最后的一次迎送工作。他乘头班车赶早，是本能和习惯，完全在情理之中。我是不应该惊诧的。

普通百姓对季先生感情那么深

季先生出身清贫。文革中他给我讲过许多家乡穷的故事。其中有一个至今记忆深刻。他说老百姓买不起盐，就在院子固定的墙角撒尿。到时候就挖起墙角的土，倒在缸里浸出盐分腌萝卜。所以，季先生一辈子俭朴，一辈子对穷苦人好。但是，他毕竟在京城当了六十多年教授，他帮助过无数青年学生、学者和文化人，对普通百姓的关爱，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参加追悼会，彻底扭转了我的想法。

在灵堂的出口处，一对中年夫妇一脸悲哀，默默地举着一幅黑底白字的挽幛：“油旋张感激您家乡人怀念您”。我曾听山东大学的蔡德贵教授说，“油旋”是山东小吃，季先生最爱。蔡教授每次来京，都给季先生带上点儿。人们走出灵堂，指着挽幛问：这“油旋”是什么？我说：这是季先生最喜欢的山东小吃。那位中年女子看了我一眼，我对她说：我是季先生的学生，

从深圳来，我们照张像。她向我靠了靠，说：季先生给我们题了词，从此我们生意就好得不得了，每天要加班。季老是我们的恩人。我问：季先生的题词有没有拿来？她说：拿来了，在存包处。我告诉她：应该拿来，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后来，他们拿来两个印制精美的“油旋”的包装盒，季先生的题词赫然醒目：“酥软香 油旋张”。这对夫妇是山东济南“油旋张”食品店的老板。丈夫叫张士华，妻子叫高连菊。祖传秘法，手艺精湛，深得季先生赞赏。可是当今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张家的生意并不很好。自从季先生题了词，生意就红火起来。

听了“油旋张”的讲述，不禁让我想起了苏东坡题字“碾玉观音”的故事。时代和情节是那么的的不同，蕴含其中的精神和道理却是完全一致的。

我竟然成了新闻亮点的发现者

7月19日的八宝山，中外记者云集。报道政要名人追悼会，有固定程式。在庄严肃穆而又浩大的人流中，如何捕捉有价值的新闻，对科班出身的记者来说，也不是一件易事。对我这个业余临时记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可是，让我吃惊的是，自己不但能找到有价值的新闻，而且成了新闻亮点的发现者。

除了上面说到的“油旋张”之外，还有一位日本教授丘山新和他学生津田量的故事。也是在灵堂的出口处，北大外国语学院程朝翔院长，正在和一位拉着行李箱的学者说话。他和我握了握手说：这位是专程赶来的东京大学教授，下午就得回去。排队没有时间，我带他从这里进去。于是，这位日本教授把行李托给他的学生看管，自己跟程院长走了。我一问津田量才知道：丘山新是季先生的学生，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非常敬仰季先生。他自己是丘山新的东大学生，现在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也非常崇敬季先生。等丘山新教授告别季先生走出灵堂，告诉我：他是季先生的学生，也是任继愈先生的学生，一天之内走了两位大师……说着他哽咽了起来。此时，新华社、文汇报等八九家媒体的记者围了上来。我看着长长的人群，就告别这对日本师生，来到排队的人群中。

来悼念的人实在太多，队伍走得很慢。我看见一位先生把一个手提袋捂在胸口，便问他：口袋里装的什么？他说：用芦苇做的季老像。我请他拿出来看看，果然是季先生的一幅芦苇画肖像。原来他名叫杨丙军，河北白洋淀人，我国知名的芦苇艺术家。这时候在栏杆外的各路记者，纷纷伸出话筒，对准镜头。

前面不远处，有一位僧人。我上去和他打招呼，原来是圆慈和尚，也是季先生的学生，在中国佛教研究所工作。他是中国当下僧人队伍中懂梵文的少数人之一，是一位学者型和尚，古称学问僧。于是，栏杆外的记者们又将镜头对准了他。和圆慈同行的还有无锡“灵山胜境”的总经理吴国平先生，他说：“灵山胜境”这几个字是季先生题的。我发现，来向季先生告别的人群中，有着太多的故事和新闻。离灵堂越来越近了，为了肃静，我只能发现而不能再采

访。

我向季先生告别了两次

我进灵堂向季先生告别，一共有两次。第一次和董友忱、白开元两位孟加拉文学专家一起排队。在入口签名处，见到了外国语学院肖老师和桂老师。当年肖老师在系图书馆工作，系里安排她兼职为季先生做些联络、收发类的服务工作。我离开东语系 25 年了，她几乎没变化。她为我翻开了一页新的签名册，我写了“季羨林先生千古 学界岱宗 后学郁龙余敬挽”几个字，便和其他人排队缓缓步入吊唁大厅。由于人太多，工作人员要求吊唁者排成一队，前后紧跟着，绕季先生遗体一周，不停留，不叩拜，一切为了节省时间。

走出灵堂，在西侧广场上遇见季先生的许多学生，有 1960 级梵巴班的黄宝生、郭良鏊夫妇和研究生刘建，1960 级印地语专业的王树英，1964 级印地语专业的黄华章、白永生，1965 级朝鲜语专业的韩振乾，等等。缅甸语专业的施振才教授已经 76 岁，专程从香港赶来。四川大学的尹锡南博士，在前几天写了一首诗《大师在七月归去——哀悼季羨林先生》，十分真情。没有和他说上几句话，就匆匆告别，因为贺剑城先生来了。贺先生是我入东语系时的总支书记，是 1956 年季先生入党的介绍人。他和系主任季先生是老搭档。如今他八十二岁了，来送老主任最后一程。他说：季先生不容易。这句话出自贺先生之口，分量极重，他们是六十年的相知相识，文革中的患难之交。

过了一会儿，乌尔都语专业的唐孟生教授来找我，说：“程院长请你和我们几个再去告别一次。”于是，我跟程院长以及王邦维、唐孟生、葛维钧等季先生的老学生，又一次进入灵堂，拜谒季先生。这一次，比较从容，我们一次次向季先生鞠躬礼拜，只见季先生坚毅而安详地躺在鲜花翠木丛中。心想从今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他那慈祥面容，听不到他那地道的山东口音。此刻，我才真正感到“耳提面命”是一种多么难得的幸福。王邦维，一向被北大同仁视为季羨林的接班人，颇得季师严谨之风。此刻，也不禁泪光闪烁。走出吊唁厅，在过道里刚好碰见从休息室开门出来的钱文忠。他是季先生的“别业弟子”，我和邦维同他握了握手，便离开了灵堂。

在出口处的广场上，一位十一二岁的少女。一身白色衣裙，手捧季先生画像，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众多记者，争相拍照。我看见她满脸泪珠，像雨天里的一支白莲花，便不忍上前采访，也不忍拍下她的模样。但是，第二天全国许多报纸都登出了这位少女的特写镜头。文字说明：7 月 19 日，一名参加季羨林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小朋友泪眼婆娑。

除了这位“雨中白莲”，前来送行的人，大都沉痛而不悲泣，追念而不哀恸。虽然，季先生历经坎坷，但毕竟功德圆满，以百岁之身辞世。大家是来送别的，表达的是一份敬重和牵挂，友谊与感恩。对我来说，还有一份兑现承诺的决心——写好《季羨林评传》。

中印友好事业必将长盛不衰

季先生逝世后，第一位从北京直接给我打电话的是中央党校的董友忱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泰戈尔文学翻译家，季羨林的忠实追随者。在他的安排下，我这次赴京的吃住都在党校，而且他还要了一辆车。他说：我是一名退休教授，按规定不够条件派车，但是说去为季先生送行，而且和你一起去，老干局就爽快地答应了。

和中央党校，季先生还真有缘分。1992年6月，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写成。一些出版社知道是好书，但是不敢出。1998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反映出奇的好。季先生说：“我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部书竟然出版了，我更万万没有想到，它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在党校校园去北门的路上，我看见“图书馆”三字似乎很眼熟，走进太湖石一瞧，果然是季先生的题词。我想，季先生和中央党校的关系，远不止这些吧。

现代媒体要求图文并茂。7月19日，我请董老师带上照相机，这样他就成了我这个业余记者专门的摄影师。董老师的专业是孟加拉语与俄语，并无摄影特长，而且年过七旬。这位当年的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全身心地忙碌着。有时，为了拍全一幅长联，他要弯下腰，甚至单腿跪地。不但无怨无悔，而且主动积极，凭着的就是对季先生的一份不变的敬仰。

7月20日，我们要去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接待印度泰戈尔大学的校长。这所大学成立于1961年，是在加尔各答泰戈尔故居的基础上兴建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散发出泰戈尔的气息。在车上，我对董老师说：如果这位校长会印地语，我直接问他对季先生的评价；如果不会，则请你用孟加拉语翻译。结果这天，董老师既当摄影又当翻译。这位校长名叫科鲁纳申图·达斯，是一位著名的梵文学家。对中国最著名的梵文学家季羨林，尽管未曾谋面，但慕名已久。他说在路上得到季教授逝世的消息，可是他们19日晚上才到北京，没能去送行。他告诉我们仰慕季先生的原因：提倡中印友好，中印文化交流的印度代表是泰戈尔，中国的代表是季羨林。他说：西方一直在挑拨中印关系，因为没有比24亿人民团结、友好更为强大的了。季先生这位卓越学者虽然去世了，但他所从事的中印友好事业，必然长盛不衰。1924年，泰戈尔带4个印度人访华。我们今天也是五个人来访。为了中印友谊，我们沿着泰戈尔、季羨林的道路，不断前进。

北外亚非学院的张西平院长告诉我，季先生生前对北外非常关心，学校领导决定出一本纪念季先生的书。要我以北外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名义，写一篇纪念文章。

总之，这次赴京参加季先生的悼念活动，所见所闻，给我的总体印象是：盛世之风，在崇文矣。

（原刊于2009年7月24日《深圳商报》）

印度邦格拉舞蹈团来深圳大学演出

朱璇

2009年4月25日晚 19:30分，由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馆和深圳大学共同主办的印度邦格拉舞蹈团演出在深圳大学国际会议厅拉开序幕。印度邦格拉舞蹈团的13名印度舞蹈家为现场500名深大师生和印度友人带来了极具旁遮普民族风格的舞蹈、器乐和演唱等8个节目，同时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也表演了傣族双人舞《修》和独舞《花腰红》。表演长达一个半小时，表演结束后，章必功校长向印度艺术家们致贺，并向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赠送礼品。

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简介

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 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于1950年4月9日成立，其创建人是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 Maulana Abul Kalam Azad，现任主席是凯伦·辛格博士（Dr. Karan Singh）。ICCR 是一个文化团体，致力于同外国开展文化对话，推动印度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现印度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迄今为止，ICCR 在全球二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印度文化研究中心。

ICCR 主要事务包括：著名学者访问计划；文化交流；举办展览会；创造性的对话；国外的印度学课程；学生福利和奖学金；出版物和多媒体产品等。

2008年6月18日，ICCR 与深圳大学签订访问学者的协议，并于同年10月至2009年1月，派遣印度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主任墨普德（Priyadarsi Mukherji）教授作为首任访问学者到访深圳大学。

印度邦格拉舞蹈简介

邦格拉舞是起源于印度北部旁遮普地区的传统民族音乐及舞蹈。旁遮普地区是印度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现代文化的摇篮。191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她说过》（usne kahā thā），描写的正是发生在旁遮普的人间真情。这部作品至今仍是印度最杰出的短篇小说，有“独一无二”、“天下无双”之誉。

传统上，旁遮普人民以邦格拉舞庆祝丰收，现在演变为庆祝婚礼及新年等不同场合而表演的节庆舞蹈。近年来，邦格拉舞也开始在全世界流行，除了传统的内容之外，还融合了

Hip-Hop、瑞格乐等多种音乐和舞蹈元素。

传统的邦格拉舞是一种结合音乐、歌唱、印度朵儿鼓的敲击以及 Algoza、Iktar、Tumbi 和 Chimta 等单弦乐器共同演奏的舞蹈。其伴乐被称为 Bolis，歌词是用旁遮普地区的语言编写的短小对子。内容涉及歌手生活所要面对以及想倾诉的话题。

邦格拉舞通常在月光明亮的夜晚表演，从缓慢的韵律开始，节奏逐渐增强。该舞蹈融合了旁遮普地区的众多舞蹈语汇。“邦格拉”本意指多种舞蹈和艺术，包括 Jhumar, Luddi, Giddha, Julli, Daankara, Dhamal, Saami, Kikli 以及 Gatka。

邦格拉舞蹈团演出节目介绍

民族管弦乐 (Folk Orchestra)

表演者将向观众呈现印度旁遮普地区典型的民族乐器，如 Algoza, Tumbi, Bagdoo, Chimta, Katto, Sap, Dhol 等。在舞蹈和歌唱时该类乐器常被使用。

民族歌唱 (Folk song)

印度旁遮普地区的乡间，人们热衷于聆听以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传奇故事。该民族歌曲能让听众领略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其歌词通常十分尖锐和简练，因而能吸引群众。其调子也十分朴实和扣人心弦。

俱玛尔舞 (Jhumar dance)

俱玛尔舞是源于旁遮普萨达尔巴 (Sandalbar) 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民间舞蹈，是该地区重要的民族传承。俱玛尔舞以独特的俱玛尔韵律为基础，是一种动作优美的舞蹈。舞蹈者将鼓手围在中间，一边轻声合唱，一边做出弯腰、摇摆、旋转、鼓掌等舞蹈的手势和动作。传统的民间唱词表达着女子浪漫的情感。

马尔威吉达舞 (Malwai Giddha)

吉达舞在印度马尔威 (Malwa) 地区十分著名，该舞蹈由身着印度传统服装的男性表演，配以插有羽毛的头巾。每一位舞蹈者都会手持如 Chimta, Dholak, Katto, Sap, Tumbi, Bugdoo, Algoza 和 Dhol 一类的民族乐器。

深圳大学所赠礼品介绍

2009年4月25日晚，印度邦格拉舞蹈团的精彩演出，获得圆满成功。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教授向印度艺术家致贺，并赠以纪念品。同时，章必功校长向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赠送礼品。这是一本名为《汉文佛经中的音乐资料》的专著。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在此书的扉页上写道：

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 (ICCR):

这本六十八万字的著作中，记载着一千多年间由印度传入中国的音乐、舞蹈、戏曲的宝贵资料。这些资料的年代始于原始佛教时期，止于晚期大乘佛学（公元7-10世纪）。我们将此书视作中印文化交流和中印友谊的真实记录。

现将此书赠送给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感谢你们派遣印度著名的邦格拉舞蹈团来我校作精彩演出。

深圳大学
印度研究中心
郁龙余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五日

喀拉拉邦教育与文化部长访问我校

黄蓉

2009年5月15日，印度喀拉拉邦教育与文化部长贝比先生（Mr. M .A. Baby）率团来访深圳大学，一同来访的代表团成员还有印度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班浩然先生、印中经济文化促进协会秘书长 Mohammed Saqib 先生、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驻广州办事处常驻代表、庞标进出口（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Shahul Hameed 先生以及广州市贸促会的王先生等。阮双琛副校长、外事处高立天主任、印度研究中心郁龙余主任等接见了贝比先生一行。贝比先生此次来访的目的，主要是借参加深圳第五届文博会的机会，商讨喀拉拉邦与深圳大学进行文化与教育交流及合作的可能性。贝比部长一行在此前已经访问了暨南大学。据贝比先生介绍，喀拉拉邦位于印度的最南端，有6所大学，高等教育覆盖率很高，是印度由共产党执政的3个邦中的其中一个。贝比先生指出，与深大的合作可以包括互派教师、学生进行两地交流（喀拉拉邦可派遣瑜伽老师），以及印度医学方面的合作。同时，贝比部长邀请深圳大学校长赴喀拉拉邦访问。

阮校长感谢贝比部长的来访盛意，并表示，深大近年的对外合作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2009年深大更是把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重要的发展任务。学校成立了国际合作拓展部，由章必功校长牵头。阮校长还当即表示可以将赴印交流纳入明年的暑期对外交流计划中，争取在2010年开展为期四周的赴印自费学习活动。初步可拟定30名学生，印度方提供课程和宿舍，并请贝比部长联系学校。

贝比部长对阮校长提出的具体合作方案非常满意，并表示喀拉拉邦部分学校或专业提供奖学金，如经济类专业，欢迎深大学生就读，并希望今后能进一步加深与深大的合作，比如实现双方大学互相承认学分制度等。

我不过从传统艺术中取一瓢饮 ——采访印度著名画家阿·罗摩钱得尔

深圳特区报 梁婷

编者按：2008年11月21日，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正式开馆，众多中印友人参加此次开馆仪式，其中包括获得印度莲花奖的印度著名画家阿·罗摩钱得尔。《深圳特区报》借此机会专程采访了阿·罗摩钱得尔先生。

阿·罗摩钱得尔（A.Ramachandran），这个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陌生的名字，在印度艺术界却享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因为他在艺术上建树斐然，更由于他对古代艺术的挖掘为印度传统保护立下了一根标杆。由于他对艺术的贡献，印度政府三年前授予他印度最高奖——莲花奖，而在中国，仅有季羨林一人获此荣誉。去年11月，他来到深圳大学参加谭云山中印友谊馆落成仪式，记者趁此机会对他进行了专访。

Ramachandran 在印地语中的意思是“月亮神”，而阿·罗摩钱得尔确实在他祖国的大地上散发着月亮般的光芒。他与中国的缘分在于，他的妻子谭元（Chameli Ramachandran）的父亲正是开创了现代中印文化交流史的谭云山。谭元也是一位画家，他们俩是印度最负盛名的画家伉俪。

在大量国外艺术网站上都能找到阿·罗摩钱得尔的相关信息。大致认为他的艺术生涯分成两个阶段。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他，在80年代之前的绘画作品一直向西方靠拢，讽刺现代文明。然而80年代之后，他的作品却有了极大改变，不仅描述市井生活的温情，印度丰

富的神话故事也成了他作画的源泉。比如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Yayati》就叙述了印度史诗MahaBharata的故事。在采访中，他为记者揭开了转变的秘密。他指出，促使他发生改变的事物有二：乌代浦尔（印度西部一个城市）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居民们生机勃勃、天真质朴的精神面貌，以及咯拉拉邦（位于印度西南部）寺庙的壁画。“他们的美一下把我倾倒了，我认为我要研究它们。在这三十年间，我每年都要到乌代浦尔的部落去写生，并且对印度各个时期的艺术都做了深入研究。我自己的艺术却不知不觉发生了改变：从原来厌世而偏激，到后来快乐而温柔。”

古代壁画对阿·罗摩钱得尔的影响之大，在他的绘画作品中表露无遗。他的作品大多是巨幅油画，而他绘画的方式是用线勾画线条，随后以五六十层油彩一层一层地覆盖，好比古代虔诚的教徒描摹自己的偶像。即使相冲的颜色，经过这样的融合也会变得极为和谐，同时色彩经久不退，艳丽得“让大自然的鲜花都为之羡慕”。

近年来，印度当代艺术成为继中国当代艺术之后又一拍卖“金矿”，许多青年艺术家一夜致富。对于此，阿·罗摩钱得尔却不以为然。“中国当代艺术存在的问题，印度也一样存在：市场的泡沫，传统的缺失，对社会永不知足的批判……年轻人以‘全球文化一体化’为幌子为自己的商业行为找理由，实际上文化根本不可能一体化。”他还略带悲痛地表示：“跟印度相比，中国还算幸运的，因为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现在还有人在画。而印度的传统绘画方式是什么？恐怕现在已没有人知道了！我并非主张要拷贝传统，但传统留下来的精神我们却是了解的，那些诗意的神话，那些闪亮的人格……如今绘画在印度已不再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是一种商业手段。”

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谈起传统来激动不已。谈起中国艺术，他坦言最欣赏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和敦煌壁画，而现代以来最欣赏齐白石，因为他的东西“最中国”。他每次出国交流，首先看的都是该国古代的艺术，“因为这好比看到了一个源头，此后的发展都是可以推算出来的。我从来不看和我同时代的画家作品。”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大事记

- ◆1996年4月25—29日举办第13届《罗摩衍那》国际大会。
- ◆2002年3月举办第九次印度文学研讨会。
- ◆2004年9月，由郁龙余教授主持，研究生参与撰写的著作《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

与中国文化》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年获得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第二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2005 年 7 月 29 日，新华社首次发布温家宝谈及《梵典与华章》的消息，2006 年 3 月 14 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提及《梵典与华章》，全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2006 年 3 月 17 日，《深圳特区报》以《总理引言出自深圳著作》为题对该书深入进行报道。

◆ 2005 年 7 月 20 日，深圳大学发文[2005]110 号决定成立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聘任季羨林为顾问，刘安武、孙培钧、黄宝生为名誉主任，郁龙余为主任，董本健、董友忱、杨晓霞、杨修正、蔡枫等为专、兼职研究人员。

◆ 2005 年 8 月 12—16 日，深圳大学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联合在深圳明华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8 月 14 日下午在该中心明昌厅，由郁龙余、黄宝生和刘曙雄共同主持的中印文学与文化关系圆桌会议是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席此次圆桌会议的有：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深圳大学、湖南湘潭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青岛大学、河南教育学院等单位从事印度研究的学者和博士、硕士生 48 人；以及印度德里大学（University of Delhi, India）的 Harish Trived 教授；英国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 U.K）的 Suman Gupta 教授。

圆桌会议共分两个议题。

首先，郁龙余教授向与会者通告深圳大学成立印度研究中心。这是继北京大学之后，在中国成立的第二个印度研究中心。聘请黄宝生教授为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郁龙余教授向黄宝生教授颁发由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签发的聘书。

其次，举行中印文学和文化关系的学术讨论会。以下人员参与发言讨论：

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在中国的译介

Huang Baosheng: Indian Classical Poetics and It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 China

石海峻：从殖民和后殖民的角度看现代性问题——以印度为例

Shi Haijun: Modernity Problems from th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with a Study of India

魏丽明：R·吉卜林和泰戈尔的对话

Wei Liming: A Dialogue between R.Gipling and Tagore

杨晓霞：镜中之像，自我的抗争：对巴克哈形象的分析（书面）

Yang Xiaoxia: The Image of Mirror: Rebellion for Self-identity——An Interpretation of Bakha

刘曙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南加州伯克莱大学南亚研究一瞥

Liu Shuxiong: A Glimpse on South Asia Studies

张 玮：目连形象的中国化

Zhang Wei: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u Lian Image

郁龙余：中印诗学发生（书面）

Yu Longyu: A Genetics Study of Chinese Poetics and Indian Poetics

黎跃进：中印近代民族主义文学比较

Li Yuejin: The Comparison of Neoteric Nationalistic Literatur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苏永旭：从作品命名看中西印文学观的差异

Cu Yongxu: On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ndi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ks Names

蔡 枫：中印诗画的互渗性

Cai Fe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terpermeability between Painting and Poetry in China and India

蔡 晶：印度神话中的森林意蕴（书面）

Cai Jing: The Imagery of Forest in Indian Mythology

黄 蓉：探诗学之幽微，阐西印之异同：《西方诗学和印度诗学的比较研究》评介

Huang Rong: A Review of *Western and Indian Poetics—A Comparative Study*

杨修正：《罗摩衍那》与《西游记》（书面）

YANG Xiuzheng: *Ramayana and Journey to the West*

张 幸：“民族诗人”与“世界诗人”：孟加拉语诗人伊斯拉姆与泰戈尔诗歌创作

Zhang Xing: “National Poet” and “World Poet”—A comparison of the poetry by Bengali poets Islam and Tagore

曾 琼：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研究

Zeng Qiong: Study on Biographies about Tagore

◆ 2005年8月16日，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在明华国际会议中心会客厅会见印度德里大学（University of Delhi, India）的 Harish Trived 教授。双方就中印关系、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建设、互派本科留学生、联合培养博士生、德里大学与深圳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蔡枫、黄蓉、江玉琴参加了会谈。

◆2005年10月13—19日，印度著名经济学、尼赫鲁大学的前任校长、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家契特（G.K.Chadha）教授，访问深圳大学。

主要行程：

14日上午，与章必功校长会见，并赠送六件珍贵礼品。

14日下午，学术演讲《以乐观主义和审慎态度观照印度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国际会议厅）。

14日晚上：《中印文化论坛》（郁龙余教授与契特教授就中印文化问题的对话，该讲稿全文发表在2005年10月17日《深圳特区报·深度对话》，2005年11月1日《深圳大学报》2006年《南亚研究》第一期）

17日上午 报告《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改革经验》（图书馆二楼），与中国学者讨论、座谈。

媒体相关报道：

《印度总理顾问深圳纵论时势》（2005年10月15日《深圳特区报》）

《只要快速奔跑才能保持领先》（2005年10月16日《深圳特区报》，刊登了契特教授第一场演讲的大部分内容）

《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2005年10月17日《深圳特区报》）

Tech Fair exchange predicted, *Shenzhen Daily*, 2005.10.17

契特教授为第七届高交会的留言（2005年10月17日《深圳特区报》）

《契特：“中印合一”缔造中印双赢》、《契特：2015年，中美经济将打成平手》（2005年10月24日《南方都市报》）

◆2005年12月12—16日 深圳大学印度文化巡礼

1. “视觉印度”——图解印度传统文化（在校园派发印度文化宣传册）
2. 印度影视专题讲座
3. 讲座：《一介儒生，胜抵百万雄十万——抗日战争中的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
4. 瑜伽讲座

◆2006年1月14日上午，来自印度PSG工商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和印中工商协会的负责人一行18人访问我校。深圳大学印度研究所中心组织我校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共15人同印方师生就中印两国大学的工商管理、经济管理和国际贸易专业的教育方向、中印经济关系、中国经济前景、香港—深圳经济发展空间和投资环境等问题进行讨论。

◆2006年3月13—16日 著名美籍华人印度学家谭中教授偕夫人黄绮淑教授，向深圳大学捐赠“谭云山文件与物品”。

主要活动：

3月13日下午14:30，深圳大学举行“谭云山文件与物品”受赠仪式（办公楼205接待厅），谭中签署《谭中代表谭云山后人捐赠给深圳大学物件清单》，章必功校长代表学校接受捐赠并发表感谢词，赠送纪念品。合影留念。

3月14日上午，谭中教授就中印关系问题与深大研究生座谈。

媒体相关报道：

《“现代玄奘”文献安家深大》（2006年3月14日《深圳特区报》）

《谭云山遗物赠深大》（2006年3月14日《晶报》）

《谭云山：梵典与华章》（2006年3月18《晶报》）

《兄弟眷属 梵典华章》（2006年4月1日《深圳大学报》，同一期报纸在第四版开辟《中印友好年专版》）

◆2006年7月13日下午，印度共和国政府规划委员会副主席顾问 Gajendra Haldea 博士访问我校。结合 Gajendra Haldea 博士的访问行程，我校召开特区经济小型专题座谈会。

◆2006年9月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出版《中印研究丛书》之首本《理解 CHINDIA:关于中国与印度的思考》（译著，*Making sense of CHINDIA: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作者为印度著名经济学家杰伦·兰密施（Jairam Ramesh），译者为蔡枫、董方峰，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年10月22至27日，我校举办“2006中印友好年·深圳大学印度节”。整个校园洋溢着欢乐气氛。“中印人民是兄弟”的标语格外耀眼，从校长、教授到学生都在心中祝福中印友谊万古长青。

深圳大学印度节获得中印两国有关机构和著名人士的大力支持，国学大师、著名印度学家季羨林，印度经济学家、总理经济顾问 G·K·契特，印度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凯伦·辛格博士、中国南亚学会会长孙培钧，著名美籍印度学家谭中，印度经济学家、商业部长杰伦·兰密施，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黄宝生，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等为印度节发来了贺词。印度驻华大使馆为印度节提供了影片。

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教授在开幕式上说深圳大学研究印度的历史几乎和校龄一样长，并殷切寄语深大学子，要努力学习印度文化，增长知识，扩大视野，增进中印友谊。学生们心领神会，对中印友好年和深大印度节有了更加深切的体认。

各大媒体对深大印度节给予高度关注，《深圳特区报》、《晶报》、《蛇口消息报》《南方都市报》等及深圳电视台都有大版面报导。

印度节期间，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的演讲《释“CHINDIA”》、泰戈尔研究专家董友忱教授的演讲《泰戈尔和中国》、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先生的演讲《亲历中印友谊》，博得了阵阵掌声。正如副校长阮双琛教授在闭幕词中所说：深圳大学印度节办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非常成功！

◆2007年1月，尼赫鲁大学原中文系主任邵葆丽（Sabaree Mitre）教授访问我校。同我校张晓红、王素霞老师就当代女性文学展开讨论；与深圳作家郁秀座谈；并为深圳大学作题为《印度二十世纪英语女作家》。

◆2007年3月30日，印度ATHARVA教育基金会旗下四所学院（孟买大学附属）的师生由印中工商商会人员陪同共19人访问深大，印度研究中心郁龙余教授和外事处处长高立天教授对客人的来访表示了欢迎，双方言谈甚欢，加深了两国学生间的了解，希望相互加强交往，两校互派学生进行短期交流。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出版《中印研究丛书》之第二本《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CHINDIA: Idealism and Realization*），主编为谭中，副主编为刘朝华、黄蓉，宁夏人民出版社。这是对2006年出版的《理解CHINDIA：关于中国与印度的思考》一书中提出的CHINDIA/中印大同全新概念的积极回应，受到学者和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

◆2007年4月25日至27日，由深圳大学和中国南亚学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印度关系国际研讨会”与“2007中国南亚学会年会”在深圳召开。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以及美国、印度等地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受到深圳大学领导高度重视，章必功校长莅会致开幕辞，热情洋溢又切中肯綮。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女士（Nirupama Rao）委托德里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教授谈玉妮（Ravni Thakur）宣读了题为 *India 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的书面发言。季羨林先生专门为本次会议发来“祝中印友谊万古长青”的贺辞，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尼赫鲁大学前校长契特教授（G.K.Chadha）发来了充满诚挚的贺信。与会代表围绕“胡锦涛主席访印后的中印关系”、“CHINDIA 的内涵及反响”、“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多个议题展开了既有学术性、又有政策建议性的讨论。会议受到中印各大媒体的关注。

◆2007年7月，应印度大使馆之约，郁龙余主任组织安排两批共100多深大师生赴广州南

越王博物馆参观“印度古代瑰宝展”。展览期间与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奥琦女士亲切交谈。

◆ 2007年11月29日上午,印度驻中国广州领事馆总领事班浩然先生(Gautam Bambawale),受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奥琦女士之托,专程访问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以及董友忱教授、杨晓霞博士、蔡枫老师和研究生朱璇、李鹏、刘著明等也应邀和总领事座谈。班浩然先生表示印度方面愿与中国在经贸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其中深圳是重要的合作伙伴。目前印度驻广州领事馆负责的签证等业务范围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海南、云南和四川。郁龙余教授向班浩然先生介绍了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的概况、中心研究成果,随后又与班先生就具体事项进行商议:诸如将印度名著《尼赫鲁自传》、《政事论》等翻译成中文,同时将中国名著《大唐西域记》(季羨林校注本)翻译介绍到印度。希望总领事推动促进举办2008年谭云山、师觉月11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中印关系高端战略研讨会。在座的其他老师和学生也与班浩然先生进行了交流,希望两国能有更多高校人员互访和留学;开展更实际、具体的文化和商业活动等等。郁龙余教授请班浩然总领事在方便之时来深大做学术报告,他欣然答应。

会谈之后,在研究中心师生陪同下,班浩然总领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即将落成的谭云山中印友谊馆。他对展馆的策划和布局非常满意,愉快地和深大师生合影留念,并表示今后会与深圳大学开展更多的交流和合作。

◆ 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女士访问深圳大学,并代表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与深圳大学签署《深圳大学与印度 ICCR 有关访问学者的协议》

2008年6月18日,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女士、印度驻穗领事馆总领事班浩然先生和副领事萨捷夫先生一行在深圳市外事办涉外管理处处长王忠民先生和主任科员那小民先生的陪同下访问深圳大学。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教授、副校长阮双琛教授亲切会晤拉奥琦女士一行。章必功校长对大使的访问表示欢迎和感谢。他指出,近些年我校与印度大学和文化机构交往频仍,我们建立了印度研究中心和谭云山中印友谊馆,致力于在南中国建立印度学研究基地,相信大使的到来,一定会进一步推动深圳大学与印度大学的交往,进一步提高深大学生对印度文化的兴趣。拉奥琦大使表示很荣幸访问深圳大学,之所以选择访问深圳大学,一是因为深圳在世界人眼中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深圳展现出来的活力与中印关系所彰显的活力相辉映,二是因为深圳大学有专门从事印度学研究的印度研究中心。她认为当前的中印关系呈现多维度的局面,并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她相信通过访问深圳大学,与师生交流,使中印更多的青年人了解彼此的文化,进而促进中印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随后大使代表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与深圳大学签署了《深圳大学与印度 ICCR 有关访问学者的协议》,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拟向深圳大学每年派遣一名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印度知名教授，到深圳大学进行为期 14 周的访问。此项协议能更进一步增强两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最后，大使引用印度古谚语“知识的财富是最宝贵的财产”来强调中印学者交流的意义。

当晚 19:00，拉奥琦大使在深圳大学科技楼第二报告厅向全校师生做了题为《中印关系展望》的精彩演讲，章必功校长向大使和总领事赠送礼品。

媒体相关报道：

《印度将向深大派遣访问学者》（2008 年 6 月 20 日《深圳特区报》）

《中印关系展望》（《深圳大学学报》）

（印度驻华大使馆增刊《今日印度》）

◆ 2008 年 10 月，ICCR 经过四个多月的遴选，最终选定尼赫鲁大学语文文化学院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墨普德（Priyadarsi Mukherji）教授作为首任访问学者到访深圳大学。按照协议，墨普德教授在深大授课 14 周，他为本科生开设了《印度文化艺术》一课，为研究生开设《中印文学比较》一课，同时在文学院、师范学院、留学生部开设多次讲座。墨教授授课全部用汉语。

◆ 谭云山中印友谊馆正式开馆

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谭云山中印友谊馆于 2008 年 11 月 21 日开馆。来自印度、美国等地的十五位嘉宾，和深圳大学师生一起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陈昊苏会长，印度西孟加拉邦邦长 G·甘地先生，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女士发来了贺信、贺词。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教授在开馆仪式上热情致词，印度驻广州总领事班浩然先生莅校祝贺，并和章校长一起为谭云山中印友谊馆揭牌。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邬玛教授，代表所有来宾表示祝贺。徐悲鸿之子徐庆平教授寄来“梵典华章情意绵长”八字题赠。谭中先生代表谭家三代致答谢词。开馆仪式由深圳大学外事处长高立天教授主持。开馆之前，章必功校长、阮双琛副校长会见了谭中先生一行，欢迎他们远道而来共襄盛举，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深大的关心与支持。

谭云山中印友谊馆开馆之后，迎来的第一场学术活动是深圳大学师生和 15 位来宾共同举行的“泰戈尔·谭云山·国际大学与中印友谊”小型学术会议，就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话题，共叙中印友谊。学术会议由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郁龙余教授主持。

◆ 世界印地语日班浩然总领事访问深大并赠送印地语书籍

每年1月10日，是印度的“世界印地语日”。印地语是印度国语。独立后，历届印度政府都十分重视推广印地语。2009年1月9日，印度驻广州总领事班浩然先生，在副总领事戈西嘉的陪同下来到我校，向学校赠送了一批印度语书籍。李永华副校长代表学校接待了他。参加接待的还有文学院院长景海峰、图书馆长黄卫平及副馆长陈大庆、外事处副处长晁委伟等。班浩然先生用印地语和汉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我校对传播印度文化和中印友谊做出了巨大成绩。李永华副校长欢迎他到访，对他的馈赠表示感谢。在交谈中，双方对深圳大学和印度高校的合作前景，充满信心。总领事表示，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主席凯伦·辛格博士是一位著名学者，今年三月有访华计划。问深大是否有意参与接待？李副校长说：凯伦·辛格先生是有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我校章必功校长曾邀请他来访，因工作繁忙未能成行。今年如果能来，深大当然欢迎。

正在我校讲学的ICCR讲席墨普德教授作了汇报发言，他感谢深大领导、师生对他的关心和支持，并将他的新作《深圳大学印象》一文送给李副校长，李副校长对墨教授的辛勤工作表示忠心感谢，说他的教学受到了深大师生的高度评价。

赠书仪式由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主持。

中午，李副校长设便宴招待班浩然总领事一行。席间，分管外事工作的阮双琛副校长来看望班总领事等，并告诉总领事，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已于12月31日挂牌。班总领事等到国际交流学院教师午餐会上回访，向全体教师表示热烈祝贺。墨普德教授应邀，引吭高歌，唱了两首中国歌曲，受到全体老师热烈欢迎。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仅限交流